

托尔斯泰夫人日记

上 卷

(1862—1900)

张会森 晨 曦译

С. А. ТОЛСТАЯ

ДНЕВНИКИ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ОМ ПЕРВЫЙ

1862—1900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8

(本书根据以上版本译出)

崇高的使命

C·A·罗扎诺娃

1

“但愿人们能够宽容我，从少女时起瘦弱的双肩上就担起了做一位天才和伟人的妻子这一崇高的使命，对我来说，可能是力不从心的。”* 1913年，在和这位伟人共同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托尔斯泰夫人对同时代人说了这样几句话。她并不是一下子就意识到了自己的独特的地位的。1862年9月的一天，克里姆林宫医生的一个十八岁的女儿索菲娅·贝尔斯成了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成了当时已负盛名的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妻子。当然，她那时并没有预料到她的命运竟然如此地不同寻常。她当时不曾知道，实际上也不可能知道，她注定要担承一项艰难而崇高的使命：她不仅要对自己丈夫的现实生活负责，而且要对后代、对文化负责。她得天独厚，才华出众，有条件承担这一复杂和重大的角色。托尔斯泰夫人远非平庸之辈；她有着过人的智慧，独立自主的性格，旺盛的精力，又异常的勤奋，具有多方面的才干，确实可以充当托尔斯泰的“内助”，因为她天性具有文艺资质，非常爱好文学，有着令人信服的文学才华。她在莫斯科大学为竞考家庭教师称号而写的作文《音乐》，被评为最佳之作。她写的中篇小说《娜塔莎》，托尔斯泰曾饶有兴致地读过，并认为蕴含着“真实与质朴的力量”（《列·尼·托尔斯泰全集》，第四十八卷第41页）**，遗憾的是她在出嫁之前把它烧掉了。托尔斯泰夫

* 见《列夫·托尔斯泰伯爵致夫人书简，1862—1910》，第4页，1913，莫斯科。

** 下面在援引托尔斯泰这部全集时，只注卷数和页数。

人对俄国文学史、古代和现代俄国文学的造诣都很深，很喜欢诗歌，尤其是费特与丘特切夫的诗。她自己也曾写诗，甚至还发表过一组题为《呻吟》的散文诗（1904年）。她对哲学表现出当时妇女所少有的兴趣。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她博览了古希腊思想家埃比克泰德、柏拉图、苏格拉底的著作，还阅读了斯宾诺莎和叔本华的著作。

进入成年期之后她爱上了绘画，往往一画就是几小时。“在这方面，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几乎赶上了我们。”M·O·格尔申宗在1904年7月12日写给他哥哥的信中说，“她实际上是个极有才能的人，大家都这样说；今年春天，尽管她过去从未摸过画笔，但是却用油彩临摹了列宾画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肖像，据说临摹得极好。”* И·蒲宁在同她结识之后写道：“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很有艺术才华……”**，跟托尔斯泰一样，托尔斯泰夫人生活中离不开音乐，她经常去听音乐会，自己也能演奏有分量的音乐作品，而在婚后的头几年里，他们俩常常一起“坐下来弹钢琴，往往四手联弹到深夜时分。”***

“根据我跟托尔斯泰一家结识以来的观察，”画家Л·О·帕斯捷尔纳克说，“我应该指出，尽管和千百个妇女，特别是和贵族阶层的妇女外表上很相似，但是她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卓越的，出众的人——够得上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配偶。她有很高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能使她在分析艺术作品、写作事业上帮助他……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由于精神方面高度发达，托尔斯泰夫人才可能参与到伟大作家的艺术世界和精神世界中去。“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最无情的

* M·O·格尔申宗：《致兄弟书信集》第163页，1927，莫斯科。

** 《蒲宁文集》（九卷集）第9卷第62页，1967年莫斯科苏联国家文艺出版社。

*** C·A·托尔斯泰娅：《自传》，载《开端》，1921，第2期。

**** Л·О·帕斯捷尔纳克：《不同年代的笔记》第281页，1935，莫斯科，苏联美术出版社。

批评家就是他的夫人……”。П·А·谢尔盖延科说。^{*}高尔基认为她是一位“坚强有力和诚挚的人”。^{**}费特对她满怀柔情，十分喜欢和赞赏她，曾写诗歌颂她。她博得去雅斯纳雅·波良纳访问的许多朋友和客人诸如Л·Л·乌鲁索夫、Н·Н斯特拉霍夫、В·В斯塔索夫、Н·Н·盖伊、М·В·涅斯捷罗夫等人的友谊和好感。

托尔斯泰夫人是一个性格有点怪的人，她神经质，热情，多愁善感，极易冲动，同时又极其坦率。从少年时代她就养成了忏悔、自我分析，把自己的感受、痛苦以及所有与自己有关的最重要的事件记录下来的习惯。从十一岁起她就写日记，这些日记她在出嫁前都销毁了。她总是感到需要写自己，写下自己生活中最重要的矛盾冲突，而且要写得惊人的坦率和真诚。她所有的散文作品都是自传性的、以实际情况为依据的。在《谁之罪》（1895）这个中篇小说中描述了她和费特的友谊，这是对《克莱采奏鸣曲》的论战性的答复，情节相同，然而是从妻子的角度来叙述的。《无词歌》（1895—1900）是她和作曲家С·И·塔涅耶夫之间的关系的路加改变的故事。收在《骷髅小木偶》（1910）这一集子中的儿童故事，再现了她的孩子们的以及她本人的生活的某些情节。

托尔斯泰夫人喜欢并善于记述的不仅是有趣的，快活明明的事情，而且也有具有深刻个人性质的，甚至是颇为病态的，悲剧性的事情。她在不同的时期写出了一系列回忆录性质的文章：《特罗依查之行》，《托尔斯泰结婚记》，《关于喜剧〈教育的果实〉的首次演出》，《回忆屠格涅夫》等等。她甚至把自己最可怕的不幸，一直到死也无法消除的痛苦都记录在故事《万尼契卡之死》中了。最后，她几乎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写作回忆录《我的一生》。

^{*} П·А·谢尔盖延科：《关于幸福的童话》，载《交易所新闻》，1916，11，26。

^{**} 高尔基：《文集》第二十八卷第137页，1953，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

然而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最主要、最必需的对话者乃是她的日记，她这部日记前后写了半个多世纪，当然，不是天天坚持写，往往出现长时间的中断。头一篇日记写于1862年10月8日，结婚两周之后，最后一篇日记则记于1910年11月9日，在托尔斯泰逝世之后。当她第一次打开自己的“记事簿”，准备开始写“对廖瓦契卡^{*}的爱情史”时，她还不知道她就是开始执行自己崇高的使命了。就在那一天，她写出了她的回忆录式巨著的第一页。

托尔斯泰夫人日记是我国回忆录性质文献中和有关托尔斯泰的文献中重要的极具特色的著作。日记的开头主要是记述了她本人的感情、情绪、内心独白以及跟丈夫的关系。成为托尔斯泰的夫人之后，她发现她的丈夫是个非凡的、比她高超得多的人物，他有他自己的神秘莫测的，不为她所控制的世界，有他自己的，不为她所知的精神生活和创作生活。这个情况也促使她写日记，从写日记中寻找慰藉和支持。“我曾设想”，托尔斯泰夫人在第一篇日记中就坦白说，“这个人将永远生活在我的眼前，我能了解他的每一个最细微的思想和感情，他一辈子只爱我一个人。”她发现她和他之间有很大距离，一想到这里她就很痛苦，她的日记里关于这种痛苦就写了很多。在头一批日记中，据她自己承认，这主要是为了“使心神集中，以哭解忧”，为了表露内心的想法，为了进行自我解剖和疏泄心头积郁而写的。“每当心绪不佳时就写日记”，托尔斯泰曾这样说她。关于头几年家庭生活的日记有着不容置疑的心理学价值，但这些日记过于单调片面，不能提供客观的生活画面，因为那些幸福的，顺遂的，和谐的日子都没有记载在日记里。无怪乎连托尔斯泰夫人本人，后来在读自己的日记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读自己的日记感到很可笑”，她自己承认道，“多么矛盾呀，仿佛我是一个多么不幸的女人。

* 廖瓦契卡——列夫的爱称，在本书中指列夫·托尔斯泰，下同。——译者

而实际上还有比我更幸福的吗？恐怕没有比我们更幸福、和谐的夫妻了。有时一个人呆在房间里不由地为自己的欢乐而笑出声来……每当我们吵嘴之后，我都写日记”。这种倾向在她婚后头几年的日记里以及在戏剧性的1910年——她患精神病，与托尔斯泰发生尖锐的冲突，托尔斯泰出走与逝世的那一年的日记里，表现得特别明显。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记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她每一次的日记都是摄下“生活的洪流”的镜头，记录雅斯纳雅·波良纳托尔斯泰家及其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记录家庭生活的场景，记录亲友和宾客的来去。当然，每篇日记中也都有托尔斯泰出场，讲到他的写作情况，他与亲友、宾客的会见，他的感受。托尔斯泰夫人日记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对日记中所描述的事件都用自已的观点、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善恶标准做了阐明。她的日记是由事实，由关于托尔斯泰和其他人——成年人和儿童，亲近的人和疏远的人——的故事，由真人真事，再加上自己内心状态的描写，抒情独白和心理学探讨熔铸而成的。托尔斯泰夫人的叙述场景是广阔的，人物是众多的。

随着她对托尔斯泰的巨大意义的认识逐渐加深，她开始意识到她的日记是不充分的。“前几天在读普希金传记时，我感觉到，如果我记录下的不是他的一般生活，而是他的精神生活，那我就是为将来关心廖瓦契卡一生官行的后代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她是这样解释她的独立于日记之外的《我的备查杂记》写作缘起的，她这部杂记于1870年开始，到1881年才结束。实际上这也是她的日记，但有明确的主题——那就是托尔斯泰及其作为艺术家的精神生活。她特意为之写下这部杂记的“后代”，获得了这样独一无二的文献，就能使他们看出文学巨匠写作的情况，了解他某些未曾实现的艺术构思、哲学议论、一闪而过的逻辑见解，这些构思、议论和见解，常常都是其他任何文献中都没有记载的。令人遗憾的是，这部《杂记》开始得过早，而又终止得过

早。诚然，1881年以后，托尔斯泰夫人并未扔下这个主题，她在一系列日记中讲述了那个时期的托尔斯泰如何写作《伊凡·伊里奇之死》、《克莱采奏鸣曲》、《哈吉—穆拉特》、《复活》这些艺术杰作以及他主要的宗教和哲理文章。

她的日记和杂记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托尔斯泰在获得新的信仰并开始捍卫“贫穷阶级”的利益之后，他的交际范围扩大了，接触的人也比以前多样化了。他所接触的人现在主要是工厂工人，革命大学生，受迫害的教派信徒，寻求真理与正义的青年，向他寻求帮助和指导的农民以及可怜的流离失所的人们。最后，托尔斯泰夫人在她的日记里记下了著名作家费特、屠格涅夫、索洛古勃、安德烈耶夫、柯洛连科、画家列宾、涅斯捷罗夫、金茨堡、文艺批评家斯塔索夫、斯特拉霍夫以及其他文化界人士，俄国和外国记者对他们家的历次访问。

托尔斯泰夫人日记的不可估量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向读者介绍了托尔斯泰这个人物在生活 and 写作生涯各个阶段的情况，把读者引入托尔斯泰各方面生活的环境之中，以很少为人所知或全然不为人知的事实丰富读者对托尔斯泰生平的了解。

从1893年开始，托尔斯泰夫人除了真正的日记之外，同时还写《每日记事》，就是在每天的日历上简短地记下当天家里发生的主要事情。在头些年，这种写在日历上的《每日记事》极为简短，常常只一两行字，因此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大约从1903年起，这些记事词句和内容都变得丰富些了，更何况它们常常接近于日记，特别是有些年托尔斯泰夫人没有写“日记”，因此这些“日志”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这些记事的注意力集中在托尔斯泰身上，记录他的工作情况，他的一些见解以及各方面人士对他的走访。就是在托尔斯泰逝世之后，托尔斯泰夫人也仍然继续写“每日记事”，一直写到她临终的前几天。在九年的时间里（1911—1919），她一天接着一天，极少有间断，写着雅斯纳雅村的生活编年史，写下一切与托尔斯泰的命运直接相关的事情。

托尔斯泰夫人的日记是文献体著作，但是在日记里显露出她的文学才能，她的观察力，显示了她三言两语就能描绘出一个人的外表，刻画出他的心理肖像，或者对之作出评价的能力；托尔斯泰夫人的日记辞藻丰富，文笔上有她自己的鲜明特色。

在托尔斯泰夫人日记中，自我分析，对心灵，而且是对复杂的、抑郁的、被矛盾的感情所折磨的心灵的聚精会神的研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这方面，毫无疑问，有俄国散文在心理分析、人的内心世界分析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对不同性格的极其简练传神的勾画，以印象主义手法所做的风俗速写和景物速写，表达内心矛盾和细致微妙的情感变化的技巧，她所掌握的全部描写手段，都证明日记作者对二十世纪初期流行的文艺手法相当熟悉。

很少有哪一位回忆录作者能够避免偏颇，对于他所描写的人物能够做到绝对准确地符合实际，提供一幅客观的肖像。托尔斯泰夫人在对人物、事件以及行为动机的评价上，也没有摆脱主观片面性。对于托尔斯泰在经历了“转折”之后所形成的那种信念，她拒不接受，这就导致了她在说明事件和家庭关系时失之片面，偏颇。

总的来说，托尔斯泰夫人日记是一部具有重大文化意义与文学史意义的文献，因为在这部日记里再现了“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列夫·托尔斯泰的面貌。

2

在差不多半个世纪的过程中，托尔斯泰夫人每一天都要参与这位伟大天才的生活，从而能够观察他的创作构思怎样产生，又怎样成为世界文学杰作，留意他内心状态的各种最细微的变化，记下伟大作家创作生活中一些极宝贵的细节。

大家知道，托尔斯泰本人也写日记，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创作过程的不同阶段，写下了自己的一些感受。同时还保存下来他作品的大量手稿，直观地说明他是如何进行创作的。但是，如果没有托尔斯泰夫人的日记，托尔斯泰创作的某些个性就不会为我们所知，我们就不可能知道，他是以如何非同寻常的责任感对待自己的天职，他的“职业”是如何难以想象的困难。

在这部多层次的日记中，最重要的层次之一是以托尔斯泰创作生活为中心的那一层次。从新婚的头几天起托尔斯泰夫人就成了丈夫的缮稿者、代办和顾问。“你在离家那天对我说：‘你是我的助手’。我是从心里乐意从早到晚为你抄写稿子，帮你做些事的。”——她在给托尔斯泰的一封信中这样说，这指的是参加《战争与和平》的抄稿工作。^{*}缮写改得密密麻麻的小说手稿——这乃是她心爱的并感到最必要的工作，这种工作可以把她引入丈夫的兴趣范围中，使她与他更加接近。“他有时跟我讲他的创作意图和计划，我对此总是感到十分高兴。我也总是能够理解他。”——她在日记中写道。关于此事，1866年11月的一篇日记中也有记载：“近来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缮写（以前未曾读过）廖瓦契卡的一部长篇小说……没有任何事物能象他的思想、他的才华那样作用于我了……我抄写的速度很快，因为我能相当快地掌握小说的发展，抓住小说的全部趣旨，我还能相当沉静地思考、体味、评论他的每个思想。我常常跟他谈论这部小说，不知道他为什么很相信我的判断，因而很乐意听取我的意见（这使我感到很骄傲）。”

的确，托尔斯泰夫人几乎缮写了她丈夫的所有最卓越的文艺作品，成为这些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和第一个批评者。在同托尔斯泰的谈话中，她有幸听到当时他不会对任何别人讲的那些创作上

* C·A·托尔斯泰娅：《给列·尼·托尔斯泰的信》第32页，1936，莫斯科—列宁格勒。（科学院出版社）。——原注

的心事和天启。

日记中艺术家托尔斯泰的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无休止的“可怕的思维工作”中，一心一意埋头于创作，沉浸在他自己创造的诗意的世界里。例如，我们知道，1898年8月28日，在庆祝自己七十寿辰的隆重日子里，托尔斯泰彻底地改变了《复活》的结局：“早晨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写《复活》，对目前自己的工作很是满意。‘你知道……’他对我说，‘他不会跟她结婚的，我今天把一切都结束了，也就是说把问题都解决了，而且是解决得那么好。’”又如在日记里复述了托尔斯泰本人讲的一段故事，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托尔斯泰讲的是“他是怎样想起要写这部小说的，”只不过是“睡衣袖子上的一条白绸刺绣”竟然产生了《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整整一章”，而且对于理解女主人公的命运又是那样重要的一章。

1910年6月在一次谈话中，托尔斯泰反驳切尔特科夫说：“人们都说灵感是庸俗的字眼，是陈词老调，然而没有灵感是不行的。”*

日记中记载的事实、观察、自白，使我们有了实际的，几乎是可以感触得到的认识，那就是对于托尔斯泰来说，灵感就意味着创作进入这样一个阶段——这时创作占据他整个身心，促使他忘我地，鼓足全身的干劲去写作。“一旦他心里涌起真正的艺术创作的洪流，那他就随着洪流一泻千里，不能自己”。——托尔斯泰夫人这样概括了她对托尔斯泰的观察。托尔斯泰的灵感是来自自身的，进行创作时就不由自主，这种不由自主对于他来说乃是最高级的自由，真正的生活。日记中有若干片断都可以看到，作家托尔斯泰因受这种强而有力的不可违抗的灵感所控制的形象跃然纸上。“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仿佛不存在了”，记述托

* A·B·戈登维泽尔：《在托尔斯泰身边》，第二卷第151页，1923，莫斯科。

——原注

尔斯泰如何结束《复活》的那段日记中写道：“他不与人来往，一人独处，全部身心都投入创作中。他独自散步，独自坐在书房里，常常都是大家吃到一半时，他才来吃中饭或晚饭，吃上两口又不见踪影了。不论什么时候见到他，都看得出来，他的脑子在紧张的活动。”即使不是写小说，而是写政论文章，根据托尔斯泰夫人的观察，列夫·托尔斯泰也是“全神贯注在写作上，这时对于他来说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了。”

日记中有大量有分量的例证，令人信服地说明，离开了专心致志的创作，托尔斯泰简直就不能生存下去。他的情绪，他的精神状态完全取决于他的“机器”是否运转得顺利，“智慧的闷葫芦”是否打开来。工作停滞不前，主题选择上动摇不定，——这样的时刻使他最感痛苦，郁闷不乐。“所有这种无所事事，……脑子休息的时间，都使他深受折磨，”日记中写道，“他说，他为自己的闲散而感到惭愧，觉得不仅有愧于我，而且也有愧于所有的人。有时他感到灵感来了，于是他便高兴起来。”这里讲的是托尔斯泰已写完《战争与和平》，但尚未着手写《安娜·卡列尼娜》那个时期。在托尔斯泰夫人日记中常见到这样的话：“列夫·尼古拉耶维奇闷闷不乐，因为他还是没有写作的灵感，”或者“他思考不下去，这使他最为痛苦”，等等。

如果工作进行顺利，托尔斯泰便感到他整个的存在是崇高的，合理的。“整个秋天他总是说：‘我的脑子在沉睡，’可是在一个星期之前，他突然完全变了：他精神焕发，开始高高兴兴地工作起来，对自己的精力和劳动都感到满意。”——日记作者这样记述了《安娜·卡列尼娜》创作史中的转折期。关于托尔斯泰写作论文《艺术是什么？》的一天，她这样写道：“他心情愉快，精神饱满，今天他写得极为顺手。”

托尔斯泰夫人注意到了托尔斯泰在忘我的劳动时期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廖瓦契卡整个冬天都在激动中写作，常常流泪。”——这就是完成《战争与和平》时期的托尔斯泰。但也常常有这

样的情形：构思和实现构思的过程进行得比较和谐，尽管也还是免不了“激动”（在托尔斯泰的语言中意为兴奋）。“从写作《战争与和平》时起，我还从未有过这样的创作情绪，我对自己写作《复活》的工作进展非常满意。”——她听托尔斯泰这样说。她的日记里还有这样的句子：“他今天写作了，心情愉快，对自己的工作很有信心”。但常常碰到的是这样的字眼：“紧张”，“急躁”，“全神贯注”，“搜索枯肠”，“苦思冥想”，只是偶而才碰到“高兴”，“愉快”这样的词。

日记里有一些零散的，但极值得注意的观察，对我们了解托尔斯泰如何工作很有帮助。

在逝世之前不久，托尔斯泰承认：“常常有些时候我大大高于平常的我，反之，也有些时候我大大低于平常的我。”* 托尔斯泰自己每天的自我总结，以及他夫人的日记，使我们有充分的根据说，托尔斯泰感到“高于平常的我”是在他从事宏伟的创作时，是在他飞腾时，在他感觉到自己的伟大的“我能”时。

托尔斯泰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极为严苛的艺术家，在描写现实，历史事件，描写过去和当代的生活，以至到描写最微小的细节方面，都不能容忍任何一点不求甚解，任意而为的态度。他的手稿，信函，丰富的藏书，以及他的同时代人的回忆文章，都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这种证据在托尔斯泰夫人的日记中也有许多。关于托尔斯泰构思一部描写“彼得大帝时代”的作品的那段文字，就极有说服力：“他十分注意细节的真实。昨天他去打猎，回来特别早，一回到家就翻阅各种资料，想知道他的穿短外衣配高领这种描写是否符合当时情况。”日记证实，除了广泛利用各种可能收集到的书刊和档案资料而外，托尔斯泰还广泛听取目击者的讲述作为“资料”。“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埋头工作，继续对《复活》进行润色”，托尔斯泰夫人写到，“他今天跟一

* A·B·戈登维泽尔：《在托尔斯泰身边》第二卷第151页。——原注

个流浪者谈话，此人曾因参加罢工坐牢四个月，最后被驱逐到外省。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听他讲故事，听得入了迷。”

关于这类谈话是如何详尽入微，我们可以从另一页日记中看出来。这页日记记述说，“年青的近卫军骑兵阿德列贝格”来到雅斯纳雅村，“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把他请到家里，向他打听了许多军队的事情，如问：派班是怎么回事？皇帝检阅何时上马？谁牵马？诸如此类，等等。”“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对尼古拉一世的历史很感兴趣，搜集与阅读了大量资料。这些都准备供写作《哈吉—穆拉特》时使用。”

日记还记述了托尔斯泰创作个性的另外一些方面：他的巨大的刻苦耐劳能力，为了弄清艺术的、社会哲学的和美学的思想而献身的精神。“现在是夜里两点钟，我仍然在誊写”，他的“助手”写道，“这是一项极其枯燥而繁重的工作，因为毫无疑问，我今天抄写的东西，明天又将会被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勾掉，重新写。他是多么有耐性，多么勤奋呀！真叫人感到惊奇！”“像波涅洛帕干活一样——今天干了，明天又重干。”她这样说明他的写作风格。

托尔斯泰对待自己作品的那种激动不安的态度使托尔斯泰夫人感到惊讶。1901年夏天，托尔斯泰得了重病，他说：“我现在站在十字路口，就是说，要么前进（走向死）……要么后退（走向生）”，说这话的前一天他度过了一个“可怕的夜”，但“当女儿玛莎今天给他送来H·H·盖伊刚刚才抄写好的文章时”，“他是那样的高兴，就象一个卧病在床的母亲，见到人家给他抱来爱子一样。”

有关托尔斯泰写作特点的某些零散的观察也很有意思。下面就是一例：“我知道，当廖瓦契卡转入阅读英国小说时，那就是说他快要动笔了”。稍后她又注意到另一现象：“他在写《哈吉—穆拉特》，但看来今天他写得不太顺手，他花了很长时间摆脾阵，这是一种征兆，说明脑子在紧张工作，但没有弄清所需要的

东西。”

把一系列个别的片断的描述联在一起，便形成一个活生生的“以忘我的精神履行自己的天职”的托尔斯泰的形象。这个形象，由于托尔斯泰夫人再现了托尔斯泰的语言，他的生动的语调，传达了他说出来的见解，他对人物、书刊的评价，他关于已经写出和尚未写出的作品的构思（这部分尤其珍贵），就显得更为丰满了。日记的某些记述可以成为领会托尔斯泰创作思想、准确地理解作品的钥匙。日记中记下了托尔斯泰关于《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的一些极为重要的见解。托尔斯泰说，在这一部作品里他喜欢的是“人民的思想”，而在另一部作品中他喜欢的则是“家庭的思想”；如果我们不认真研究日记中转述的托尔斯泰的这些话，就谈不到对《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的全面深刻的研究。长期萦绕在托尔斯泰脑际的那部描写十二月党人的长篇小说的构思，所以未能实现，也许就是由于他想“对待十二月十四日的事件，不谴责任何人，不论是尼古拉·巴甫洛维奇，也无论是肇事者，而是要理解所有的人，并且仅只是描写他们”。如果我们忘记，还在1878年托尔斯泰就力图实现“普通人的生活和上流社会的生活相冲突”这个构思，那么就不可能理解包括《复活》在内的他的文学活动的整个最后阶段。

托尔斯泰的艺术世界在他夫人的日记中通过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出来，这是托尔斯泰夫人日记的不容争辩的品格。

3

托尔斯泰夫人日记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有很多支脉的家庭编年史，它反映了这个家庭的各个阶段，反映了这个家庭中发生的所有变化。在众多的生活轶事、矛盾冲突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一切都给翻腾了过来的”历史时期。因此托尔

斯泰夫人这部日记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和生活情况，也很有价值。但日记的“家庭性”之所以具有特殊意义，乃是因为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贵族家庭的编年史，而是托尔斯泰一家的编年史，涉及到与托尔斯泰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几代人。这部日记所以有着重大的价值还因为它记叙的是发生“在俄国历史的两个转折点之间，即1861和1905年之间的那个历史时期”的事，是托尔斯泰“主要活动时期”的事*，而且还涉及以后的十五年，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这样一些重大事件。

托尔斯泰夫人在详细记述家庭生活，家庭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同时，鲜明地表现出了变化着的时代的特征。

在头几年，当年轻的家庭刚刚形成，而历史的进程还相对的平静的时候，日记里所记叙的那个时期的雅斯纳雅村的 生活是“平静的，快乐的，”尽管这段生活蒙上了嫉妒的阴影，带有“爱情的伤痕”，但那种爱情是相互的，炽热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幸福……这一切绝不会随同生命而结束”，——托尔斯泰婚后不久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见全集第四十八卷第46页）。“您知道我前几天见到谁了？新的托尔斯泰”，1862年10月И.П.鲍里索夫对屠格涅夫说，“他偕同夫人到尼科尔斯科耶村来住了几天。她很漂亮，是个美人。聪慧，朴实，看来很有个性，也就是说很有主见。他十分爱她。”托尔斯泰的这位富有观察力的友人接着又预言般地补充说：“不，他心灵中的风暴还未平息下来，——不错，由于蜜月的缘故，这风暴是静下来了，但过后仍将掀起狂涛巨澜。”**

但风暴暂时并未掀起，托尔斯泰由于他的理想得到实现，家里树立起了他童年时所熟悉的，也是他所喜欢的那种祖传的家风，而感到幸福。从托尔斯泰夫人关于她自己，关于她的子女，关于子女们的嬉戏，娱乐，学习，关于她自己和丈夫的事实的叙

* 《列宁全集》中译本，第16卷，第329页，1963，人民出版社。

** 《屠格涅夫纪念文集》第三册，1967，3，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

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托尔斯泰一家那时过的是一种知识分子贵族家庭的宗法庄园生活，托尔斯泰家里的这种生活仍然是封闭性的，恪守传统的。托尔斯泰不仅还未曾怀疑这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而且在《战争与和平》中他还从自己的理想角度诗情画意地予以肯定的描写。那段岁月如托尔斯泰自己承认的，是他处于“最好的生活条件”下的时期（见全集第十六卷第7页），但这个时期并没有持续多久。

七十与八十年代交替的时期，托尔斯泰精神方面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他这时“看清了一切复杂的，零散的，混乱的和无谓的生活现象”，发现他所谓的“最好的生活条件”是极其不公平的、不道德的。他大声疾呼说：“我宣布放弃我们这个阶层的生活，因为我认识到，这不是生活，只不过貌似生活，我们的优越的生活条件使得我们不理解生活……”（全集，第二十三卷第47页）在“醒悟了”的托尔斯泰面前，残酷的现实暴露出它的一切“尖锐的矛盾”，他看到人民陷于绝望的境地，生活困苦，没有权利。“他为人民所受的不幸和不义而痛苦，为人民的贫困而痛苦，为桎梏于监牢中的人们而痛苦，为人民的愤恨、沮丧而痛苦，——所有这一切都强烈地作用于他那敏感的心灵，使他的生命受到煎熬。”托尔斯泰夫人用这样几句话为我们稍稍打开了整个世界观“改变”时期的托尔斯泰的内心世界。在俄国上层和下层之间的斗争中，托尔斯泰无保留地站在下层群众一边，他以人民的眼光观察现实，人民的意向、感情和痛苦成了他自己的意向、感情和痛苦。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他到处发现“富者的奢华和贫者的穷困之间的尖锐对立”。在捍卫人民权利的斗争中，托尔斯泰表现出惊人的勇敢，他不怕“社会舆论的压力”，“不畏强权”，在他自己的著作中毫不妥协地、英勇地揭露、否定“现代的一切国家制度、宗教制度、社会制度 and 经济制度”，* 他揭露和否定了当代俄国社会的一切规章制度。现在

* 《列宁全集》中译本，第16卷，第330页，1963，人民出版社。